



望乡诗人庾信

钟优民 著

吉林大学出版社

望乡诗人庾信

钟优民 著

吉林大学出版社

1146814

望乡诗人庾信

望乡诗人庾信

钟优民 著

吉林大学出版社出版 长春市南关区全安印刷厂印刷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850×1168 大32开 8.75印张 216 000字

1988年3月第1版 1988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 200册

ISBN 7—5601—0086—4 / I · 9

定价：2.90元

5180411

DB 78/15

目 录

一、峥嵘岁月	动荡时代	1
二、仕宦世家	书香门第	23
三、生于安乐	死于忧患	31
四、生涯有始	天道虚橐	54
五、枯木填海	青山断河	78
六、穷者达言	劳者歌事	107
七、诗追陈王	雄健沉郁	124
八、赋比屈宋	遒劲哀怨	176
九、文齐潘陆	富博苍凉	202
十、高瞻六代	永放异彩	230
附 录		
	庾信年表	269
后 记		274

峥嵘岁月 动荡时代

庾信生于公元513年（梁武帝天监十二年），卒于公元581年（隋文帝开皇元年）。他一生活活动在南北朝后期，当时社会政治、社会经济和社会思潮的变革和发展，对庾信思想和创作有着深刻的影响。

公元六世纪，我国继续处于混战连年、政局不稳的动荡时期。黄河流域的北魏政权逐渐进入分崩离析的没落阶段，朝政腐败，变乱迭起；长江流域的建康政权，朝代先后递嬗，短暂的繁荣时而有之，但昙花一现，转瞬即逝。就整个中国而言，南北对立，纷争不断，战争的乌云始终笼罩神州大地，人民难以休养生息，国家无从富强昌盛。南齐末年，东昏侯萧宝卷昏庸无道，横征暴敛，赋役繁重，王公贵族恣意骄奢，挥霍无度，内部倾轧，诛杀相继，恐怖异常，雍州刺史萧衍乘时崛起，做着改朝换代的准备。501年，萧衍带兵沿长江东下，打进建康，结束了萧齐这个仅存在二十三年的短命王朝，自立为帝，国号梁，这就是梁武帝。庾信诞生之时，萧梁代齐已经十二年。萧衍在位四十八年，前期尚属励精图治，有所作为，南朝一度呈现安宁稳定，歌舞升平，正如庾信回顾梁初全盛日时所描绘的：“于时朝野欢娱，池台钟鼓，里为冠盖，门成邹鲁。连茂苑于海陵，跨横塘于江浦。东门则鞭石成桥，南极则铸铜为柱。橘则园植万株，竹则家封千户。西颺浮玉，南琛没羽。吴歆越吟，荆艳楚舞。草木之遇阳春，鱼龙之逢风雨。”（《哀江南赋》）但梁武本质上却是一个伪善残暴、愚蠢贪婪的封建统治者，晚年沉溺佛教，疏于政务，对门阀贵族一味迁就，姑息养奸，遗祸无穷。当时宗室诸王皆有

拥兵大权，他们各自为政，相互倾轧，俨然大大小小的独立王国，渐成外重内轻、尾大不掉之势，终于导致548年侯景之乱以及接踵而来的诸王混战，使江南遭到空前的大破坏。始兴太守陈霸先起兵讨侯的过程中逐渐壮大自己实力，552年，他和王僧辩联合讨平侯景。在这次叛乱中，梁朝长江以北土地尽被西魏、北齐抢占，长江以南到处是割据势力，以至萧绎在江陵自立为帝，听从他号召的不过千里，民户不满三万。梁宗室萧誉，原为雍州刺史，他和梁元帝不和，于554年勾结西魏，攻陷江陵，萧绎出降后被杀。萧誉建立了一个向西魏、北周称臣的傀儡政权——后梁。北齐步西魏的后尘，也想在江南扶立一个傀儡，王僧辩在北齐威胁下，屈服鲜卑贵族的意志，迎立萧渊明回建康做了皇帝。陈霸先反对，起兵杀掉王僧辩，废渊明，复立萧方智为帝。北齐出兵干涉，侵占石头城，陈霸先在广大汉族人民支持下，打败了北齐的进犯，江南军民避免了一次鲜卑贵族的蹂躏，汉族政权得以保持。557年，梁敬帝退位，陈霸先黄袍加身，是为陈武帝。南朝政权延续到陈，已是气息奄奄，其疆土只有长江中下游以南地区和淮南江北一小块地方，士族官僚和寒门‘佞幸’均腐朽不堪，特别是亡国之君陈叔宝登基后，大兴土木，建造楼阁，宠幸女妃，奢侈腐化已极；阶级矛盾和统治集团内部矛盾进一步加剧，不几年的工夫，终于走上覆灭的道路。

当时中国北方，自公元439年以来，一直由北魏统治。孝文帝元宏在位期间（公元471—500），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实行了几项重要改革，加速鲜卑族拓跋部封建化的过程。他把魏都从平城迁到洛阳，大力推行汉化，禁止鲜卑服装，要求鲜卑人改穿汉服，禁止鲜卑语，改说河南洛阳话，下令改革鲜卑姓，他自己改姓元，其他改姓长孙、穆、奚、陆、贺、刘等；把鲜卑的穆、陆等八姓定为国姓，和汉族大姓崔、卢、郑、王同等待遇，享受同样政治特权，并且承袭魏晋以来的门阀制度，“以贵袭贵，以贱袭贱”，按门第高低来分配官职。孝文帝还通过婚姻来加强

鲜卑贵族与汉族大姓的联系，以掩盖和缓和少数民族与汉族的矛盾，更好地压迫剥削少数民族与汉族两方面的庶民，巩固北魏统治。从中可见“汉化”实质是有计划地、自上而下地采用封建剥削方式以及与之相适应的一套上层制度，如政治制度，政治机构，保护封建所有制的法律，宣扬封建统治阶级的文化、艺术和宗教等，用汉族的封建文化代替他们原有的奴隶制文化。民族融合是总的发展趋势，是难以遏制的历史潮流，但民族之间的矛盾、斗争仍然存在，有时还表现颇为尖锐。535年，北魏正式分裂为东魏和西魏，各拥立一个傀儡皇帝，朝政分别由权臣高欢和宇文泰把持。高欢，又名贺六浑，是一个鲜卑化的汉人；宇文泰，字黑獭，鲜卑族。550年，高欢的儿子高洋废掉东魏孝静帝，建立齐朝，史称北齐。北齐推行大鲜卑主义，对汉人很轻视，而且昏君当道，朝政腐败，诸王猜忌，内部矛盾重重，只存在二十七年，很快就寿终正寝。557年，宇文泰的儿子宇文觉夺取西魏皇位，国号周，史称北周。北周是以宇文氏为首的鲜卑贵族和汉族地主的联合统治。这个政权的统治区域大致包括今陕西、宁夏、甘肃和四川的大部，山西西南部、湖北西部以及河南西部。东魏比西魏人口多出一倍以上，北齐北周对立，原本前强后弱，但由于宇文泰能够吸收汉族大地主参政，实行改革，刷新吏治，整理户口和财政，安定人民生活，打击豪强分权势力，强化中央集权，逐渐转弱为强。到周武帝，北周国力达到鼎盛。武帝宇文邕是一个雄才大略的政治家，锐意整饬朝政，善于组训军队，能得士卒死力，史书赞其“苦心焦思，克己励精，劳役为士卒之先，居处同匹夫之俭。修富民之政，务强兵之术，乘仇人之有衅，顺大道而推亡。五年之间，大勋斯集。”（《周书·武帝纪》）577年，北周灭北齐，统一北方。581年，隋文帝杨坚废掉周静帝，建立隋朝，587年灭后梁，589年灭陈，结束南北朝分立近三百年的对抗局面，统一全国。在这漫长的分裂过程中，中国境内各族人民通过长期反对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的共同斗争，逐渐增强以汉族为中

心的民族大团结，随着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民族矛盾逐渐退居次要地位，而包括汉族人民在内的各族人民与各族统治者之间的矛盾和斗争，重新日益尖锐起来。到北周后期，鲜卑及其他久居内地的少数民族，在经济生活和语言、风俗、习惯等方面，均已大致与汉族合流，充分显示少数民族接受汉族先进生产方式和先进文化后而呈现民族大融合的强大威力，这是历史发展中不可阻挡的潮流，是不以个别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这种融合是全国社会经济加速发展和统一政权在另一个新的基础上重建的前提和条件，它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进步作用是应该予以充分肯定的。

南北朝末年，无论南北，对人民的剥削和压榨皆很残酷。江南地区，湖泊纵横，土地肥沃，素称鱼米之乡，发展农业有着极好的自然条件。萧梁前期，南方经济有较大发展，注意兴修水利灌溉工程，在豫州苍陵立堰，浇田千余顷，修整芍陂，浇田万顷，提高了农田产量；造船技术颇为先进，已能制造载重量达二万斛的大船，长江航运迅速发展；又据史书载，陈霸先曾对裴忌说：“三吴奥壤，旧称饶沃，虽凶荒之余，犹为殷盛”（《陈书·裴忌传》），历经侯景之乱的大破坏，江浙一带农业还是如此发达，可见当时生产恢复之快速。但广大江南人民在官府和地主的残暴统治下，仍然过着牛马不如的悲惨生活。其时赋役奇重：“梁兴以来，发人征役，号为三五。及招募将客，主将无恩，存卹失理，多有物故，辄刺叛亡；或有身殒战场，而名在叛目。监符下讨，称为逋叛，录质家丁；合家又叛，则取同籍；同籍又叛，则取比伍；比伍又叛，则望村而取”（《南史·郭祖深传》），竭泽而渔，无所不用其极；兵役之外，还有工役、运役、杂役等，不但名目繁多，而且征调频仍，男丁征毕，甚或驱使女子服役：“郢州当涂为剧地，百姓贫，至以妇人供役”（《梁书·安成王秀传》），这种现象并非个别，以致梁武帝不得不在公元541年11月下诏“停在所役使女丁”；供役者多平民百姓，士族则在免役之列，而且系限期征集，过期则罚租调，役政残民之甚，直可置人于死地。

南朝土地大多集中在少数贵族和大地主手里，而国家赋税却落在广大劳动农民身上：“齐末昏乱，政移群小，赋调云起，徭役无度，守宰多依附权门，互长贪虐，掊老聚敛，侵扰细民。”（《梁书·良吏传序》）对此，梁初虽欲有所改革，实行“去（人）货，计丁为布”的实物征收办法，但赋税仍然极为繁重：丁男调布绢各二丈，丝三两，绵八两，禄米二石，丁女户调为丁男之半。正赋之外，地方贪官污吏的巧取豪夺更是骇人听闻，梁时有个郡太守，公然对人说：“我为郡有四尽：水中鱼鳖尽，山中獐鹿尽，田中米谷尽，村里人庶尽。”（《南史·鱼弘传》）郢州刺史曹景宗“在州聚敛，于城南起宅，长堤以东，夏口以北，开街列门，东西数里”（《梁书·曹景宗传》）。梁武帝子萧纪在益州做刺史，搜括所得，用一万斤黄金铸成金饼，用五万枚白铜铸成银饼，每饼各重一斤。临川王萧宏有私库百间，藏钱三亿余万，布、绢、丝、绵、漆、蜜以及各种杂货无法计算。还有更多的地方土豪恶霸，横行乡里，为非作歹，欺压百姓，从事劫掠，与盗贼无异。社会财富如此集中，下层人民生活无着，往往被迫逃亡，致使土地荒芜，生产凋敝，劳力大大减少。为此，梁武多次下诏，禁止兼并，指出“顷者豪家富室，多占取公田，贵价赋税，以与贫民。伤时害政，为害已甚。自今公田悉不得假于豪家”、“公家屯戍，封炷者悉开常禁”（《梁书·武帝纪》），开放山泽，便民取利，诱骗逃户回乡，但这些多属空头支票，很难落实，因而农户仍然一天天减少。随着人民积怨的加深，反抗日烈，505年益州有焦僧护起义，510年宣城有吴承伯起义，542年安城有刘敬躬起义等。南北对立，干戈扰扰，受害最深的还是小民百姓，梁武为了阻遏淮水倒灌北魏南边的寿阳城，征调二十万人，耗费大量物质，死了许多民工，筑成浮山堰，516年淮水暴涨，浮山堰倒塌，淮河两岸城镇村庄悉被摧毁，十多万军民漂流入海，葬身鱼腹。南北交兵，战胜者肆意掠夺人口，以补充劳力，尤为人民所深恶痛绝，如西魏破江陵后“掳其百官及士民

以归，没为奴者十余万”，就是典型的事例。更有甚者，豺狼成性的胡酋将领，竟以人肉为军粮，以多杀为快。侯景为同化于鲜卑之羯人，围困台城时，纵兵杀掠，交尸塞路，当时城内缺粮，“军人屠马于殿省间鬻之，杂以人肉，食者必病，贼又置毒于糗，于是稍行肿满之疾，城内疫死者大半”（《南史·侯景传》），景每出师前，告诫诸将，“若破城邑，净杀却，使天下知吾威名”，破广陵后，竟把成群的人半身埋入地下，驰马射死。梁军反攻侯景，其统帅亦复视人命如草芥，王僧辩攻克建康，人民争往迎接，号为王师，僧辩却纵兵掠夺，时人谓“王师之酷，甚于侯景”，致使建康户口百遗一、二，秦淮河南岸极目无烟，真是以暴易暴，惨不忍睹。富庶的三吴，经此浩劫，一度荒凉凋敝，人迹罕见，使江南农业生产遭到巨大破坏。

中国北方经过北魏一系列改革，实行均田，整理户口，注意减轻人民负担，奖励农业生产，促进了经济的发展，户口大增，到公元520年，民户比西晋全盛时的太康（晋武帝年号）增加一倍，超过五百万。但北魏末年战乱频仍，地方豪强，乘机大肆搜括，鱼肉小民：“魏自孝昌（525—527）以来，豪家大族，鸠率乡部，托迹勤王，规自署置。……损害公私，为弊日久。”（《北齐书·文宣帝纪》）社会上强弱相凌，恃势侵夺，富者连畛巨陌，贫者地无立锥，两极分化，日见严重。当时鲜卑贵族占有大片耕地和大量半奴化的农民，铺张浪费，挥金如土，北魏都城洛阳，贵势之家，各营第宅，车服、器玩，无不奢靡已极。象“高阳王雍，富贵冠一国，宫室园囿，侔于禁苑。童仆二千，妓女五百。出则仪卫塞道路，归则歌吹连日夜。一食值钱数万。……河间王深，每欲与雍争富，骏马十余匹，皆以银为槽，窗户之上，玉凤衔铃，金龙吐旒。尝会诸王宴饮，酒器有水晶钟、玛瑙碗、赤玉卮，制作精巧，皆中国所无。”（《通鉴》卷一四九）统治阶级填不满的欲望，再加上广建佛寺，耗费了无数人力和物力，朝廷财政收入大大减少，乃至卖官鬻爵，无所不用其极。宣武帝

在位时(500——516)，吏部简直成了开价卖官的市场，大郡二千匹绢，次郡一千匹绢，下郡五百匹绢，其他官职，也按等论价出售。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守边之将，亦“皆无御贼之心，唯有通商聚敛之意。……财货往还，相望道路。”（《魏书·袁翻传》）广大人民在北魏朝廷沉重的赋役压迫下，简直喘不过气来。北齐规定，率人一床调绢一匹，绵八两，垦租二石，义租五斗；北周规定，有室者每年赋绢一匹，绵八两，粟五斛。尤为人民所苦者，则为朝廷所征收的绢布，地方官往往任意增加长度，原来规定绢每匹长四丈，可是有的地方却增至七、八丈为一匹，此外租米也往往加倍，以饱私囊。徭役上，北朝主要役使汉人，鲜卑人多任兵役（北齐末年，汉人服兵役方才制度化），如修鹿苑，修驰道；建宫室，造城郭等，每有营缮，常常征发数十万人，数十日方罢，以至出现大规模逃避徭役的事：“众役仍烦，百姓之情，方多避役。”（《魏书·李孝伯传附安世子扬传》）更有甚者，官商勾结，共同欺压百姓，北齐天统、武平之间（565——576），“诸商胡负官责息者，宦者陈德姓，纵其妄注淮南富家，令州县征责，又敕送突厥马数千匹于扬州管内，令土豪贵买之，钱直始入，便出敕括江淮间马，并送官厩，由是百姓骚扰，切齿叹怨。”（《北齐书·卢潜传》）高欢部将李文忠任光州刺史时，乘州内灾荒，一次就放贷十五万石粮食，通过高利贷剥削，大发横财。在北周统治地区，周武帝即位后，注意接受汉族先进文明，实行一些缓和社会矛盾的措施。公元565年，开始释放奴婢和杂户为平民。577年灭北齐后，又下令释放北齐境内的杂户，这些杂户，自从他们的祖先被征服，为官家当牛马已一百三、四十年，接着又宣布赦免自534年以来在东西战争和南北战争中被掠为奴婢的人，使被束缚的生产力得到解放。同时注意发展农业生产，562年在蒲州开河渠，在同州开龙首渠，以广灌溉。为限制地方豪强兼并，北周还颁布“刑书要制”，规定劫盗财物，隐没户口和土地的人要办重罪。这些政策都是有积极进步作用的。但由于

长期战乱，中原之地，田土荒芜，生产凋敝，所在皆是，一直延续到唐初，657年10月唐高宗至汝州，还曾向中书杜正伦说：“此间田地极宽，百姓太少。”北朝鲜卑贵族长期的反动统治和残酷剥削，加深了统治者和各族人民之间的尖锐矛盾，人民起义不断爆发。500年齐州有柳世明聚众起义，509年，泾州有刘慧汪起义，515年，冀州有僧人法庆起义。523年，北部“六镇”人民暴动，以后逐步发展成各族人民的联合起义。524年，陕北、陇东地区有万俟丑奴（鲜卑族）领导的起义，秦州地区有莫折大提（羌族）领导的起义，527年，叱干麒麟（鲜卑族）和胡弘祖（高车族）领导的义军占领了幽州和北华州。六世纪初期黄河流域各族人民这些起义，最后虽然先后被北魏统治者和地方豪酋所分化、瓦解和残酷镇压下去，但却沉重地打击北魏的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瓦解了北魏（公元386—534）封建王朝。地主阶级的反动武装一方面共同镇压人民起义，一方面又互相争霸，结果出现东、西魏两个封建割据政权，与割据江南的梁政权三分鼎立。当时参加起义的成员包括鲜卑、匈奴、敕勒、丁零、羌、氏和汉族的广大人民，他们在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的实践中增进了彼此的了解，减少了长期以来形成的民族隔阂与成见，大大加速了各民族进一步融合的进程，为中国历史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

这个时期，无论南朝还是北朝，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和斗争一直十分尖锐、复杂。在地主阶级内部，门阀之风很盛，士庶之别极严，正如史书所记载的：“过江则为侨姓，王、谢、袁、萧为大。东南则为吴姓，朱、张、顾、陆为大。山东则为郡姓，王、崔、卢、李、郑为大。关中亦号郡姓，韦、裴、柳、薛、杨、杜首之。代北则为虏姓，元、长孙、宇文、于、陆、源、窦首之。”（《唐书·儒林·柳冲传》）这些高门望族，在车服、婚姻、仕宦、赋役各方面皆享有特权，高踞庶族寒门地主之上。拿仕进而言，朝廷选用官吏，主要考虑其祖先做过什么大官，有几代人作过官，然后再看本人才德。由州郡“中正”官向吏部推

荐，吏部依品授官。充任“中正”者，皆世家大族出身，他们控制了评定人物大权，当然不会真正按才能选官，而只会单纯以家世、声名的高低决定取舍。而且进入仕途后，职闲、廩重、品高之职，照例多由士族担任，繁剧品低之职，则为寒族屈就。正因为士庶待遇相差如此之大，所以寒门士人千方百计挤入士族行列，以至社会上不断出现“冒袭良家，即成冠族；妄修边幅，便成雅士，负俗深累，遂遭宠擢，墓木已拱，方被徽荣”（《梁书·武帝纪》）这种鱼目混珠的现象，冲击士族固有的特权，展开着激烈的较量。随着寺院经济的发展，僧侣地主与世俗地主之间的矛盾与日俱增，同时严重影响国家的财政收入，为此，郭祖深曾向梁武帝建议削减寺院僧尼，以缓和佛教与中央朝廷的矛盾：“请精加检括。若无道行，四十以下，皆使还俗附农。罢白徒、养女，听蓄奴婢，婢唯著青布衣，僧尼皆令蔬食。如此则法兴俗盛，国富人殷。不然，恐方来处处成寺，家家剃落，尺土一人，非复国有。”（《南史·郭祖深传》）北魏寺院控制的“僧祇户”（农奴）和“寺户”（奴隶）也是不向朝廷交税服役的化外之民，僧尼多必然影响租调、徭役的摊派，为此，北朝朝廷也陆续采取过一些限制佛教寺院的办法，如检括僧尼，强使因逃税入教而实无道行的僧众还俗，限制僧人私自游涉民间，加强对僧尼生活和活动的管理，限制修建寺庙，限制人民私自出家。北齐文宣帝曾下诏指责“缁衣之众，参半于平俗；黄服之徒，数过于正户。所以国给为此不足，王用因兹取乏。”（《广弘明集》卷二十四）北周武帝亦曾勒令僧道还俗，把寺观财产分赐臣下，使国家获得成百万人口和大量赋税。在上层贵族，特别是皇室内部，不分南北，毫无例外地都在进行激烈的生死搏斗。梁武帝原曾煞费苦心，想用骨肉恩爱来改变宋、齐两朝的骨肉相残，因而对诸宗室王特别宽厚仁慈，有罪也不重罚，到头来事与愿违，在他晚年，身边陆续演出一幕又一幕比宋齐更为激烈的骨肉相残的丑剧。围绕着皇位继承问题，诸王勾心斗角，达到了丧尽天良、

骇人听闻的程度。当初萧正德曾过继给武帝做嗣子，后来添了太子萧统，他心怀不满，北上投敌，魏待他甚薄，跑了回来，武帝不究既往，恢复了他的西丰侯爵位，可谓仁至义尽，但侯景乱起，他仍旧当了内奸。又金陵被困时，各路宗室王统率的援军，号称百万，却多顿兵城下，或师次旅途，观察形势，徘徊不进，甚至互相猜疑、牵制，面对梁武危在旦夕，就是见死不救，结果京师陷落，梁武、简文父子皆成阶下囚，不久，一个饿死，一个被杀。从此萧梁王朝一蹶不振，名存实亡。552年，湘东王萧绎江陵即位称帝，他仍把全部心血放在火并宗室上，甚至杀害功臣，弄得上下猜忌，人人自危。在北朝，鲜卑贵族和汉族大地主，围绕着汉化，实质即封建化问题进行了各种不同形式的长期斗争，最后以保守贵族的失败而告终。但魏孝文帝死后，纲纪废弛，王室内部倾轧加剧，互相残害，魏宣武帝防卫诸王，殆同囚禁。宣武死，权臣尔朱荣拥立孝庄帝，自己垄断朝政，正如庾信所描述的：“于时洛邑乱离，当涂危逼，礼乐征伐不出于天子，举贤诛暴实在于强臣。”（《乾干弘神道碑》）不久，尔朱荣被诛，其部曲反叛，杀孝庄帝，拥立长广王元暉为帝，不到一年，废之，又另立元恭为帝。继而高欢崛起，奉元朗为帝，史称安定王，灭尔朱氏。一直到北周末年，北朝上层统治集团的斗争始终不息，如周宣帝即位，先后诛同族宇文宪、宇文孝伯等先帝重臣，杨坚代周过程中，更是大杀宇文宗室，其主要成员不分老幼，几乎全部斩尽，连史家也不能不为之慨叹：“歼王侯烈于燎原，悠悠邃古，未闻斯酷”。（《周书·文闵明武宣诸子传论》）充分反映出封建上层统治阶级尔虞我诈、弱肉强食的凶残本性。

南北朝后期，在意识形态领域内，各种社会思潮彼此竞争，互为消长，呈现出纷纭复杂的局面。就中国思想发展总的进程看，公元六世纪是儒家的衰落期，但统治阶级为了以王权控制教权，多半仍以儒学为正统思想，用以操纵佛、道，统治人民，梁武帝正是这样一个典型代表。他对儒、道、佛三者采取兼用并蓄

的态度，用儒家的礼来区别富贵贫贱，用道家的无为来劝导人们不要争夺，用小乘佛家的因果报应来解答人为什么应该安于已有的地位。为此，他大力提倡三教同源之说，并在《会三教诗》中以日比佛，以儒、道比众星，说“穷源无二圣，测善非三英”，所谓无二非三，就是佛教最高，儒、道为辅。昭明太子、简文帝、元帝都是不废儒术而又嗜好谈玄，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无非以此麻醉人民的反抗意志，巧固封建统治秩序。在士大夫阶层中，儒生兼通道、释者不乏人在，据《梁臣·儒林传》载，贺玚子革，历仕俸禄不给妻儿，专拟还乡造寺；大史叔明，少善《庄》、《老》，精通三玄；皇侃，日诵《孝经》二十遍，以拟《观世音经》；梁末玄宗领袖周弘正“特善玄言，兼明释典，虽硕学名僧莫不请质疑滞”。（《陈书·周弘正传》）《陈书·儒林传》载，沈德威每自学还私室，即讲授，道、俗受业者数十百人；陆庆，覃心释典，经论靡不该究，以禅诵为能事。《北齐书·儒林传》载，孙灵晖，常请僧设斋，传经行道；《周书·儒林传》载，卢光，好玄言，崇佛道。梁朝儒学一度相当兴旺，魏晋南北朝几百年，修礼之盛首推梁代之五礼（吉、凶、军、宾、嘉），共一千余卷，八千零一十九条，朝野上下，很多儒生精通三礼之学。梁武帝还设置《五经》博士各一人，颁《立学诏》，提出“建国君民，立教（儒学）为首，砥身励行，由乎经术”，并著有《周易讲义》、《中庸讲疏》等，大力倡导利用儒学来统治和麻醉人民。北朝儒学亦颇盛，朝廷祭先圣（孔子），立太学，作明堂，置五经博士，经学势力统治意识形态领域。魏宣武帝曾大选儒生，以为小学博士，员四十人，“学业大盛，不可胜数。大者千余人，小者犹数百”（《魏书·儒林传》）。北齐时“横经受业之侣，遍于乡邑。负笈从宦之徒，不远千里。伏膺无怠，善诱不倦”（《北齐书·儒林传》）。北周时亦复“开黉舍，延学徒者比肩，励从师之志，守专门之业，辞亲戚，甘勤苦者成市”（《北周书·儒林传》）周武帝重儒学，定三教先后，儒为第一，周宣帝追封

孔子为邹国公，并于京师置孔子庙，按时祭享。佛教在这个时期也得到很大发展。君主看到佛教可以驯化好乱之人心，多极力提倡、奖励。士大夫阶级因战乱频仍，内心无所归趣，纷纷借佛以为精神安慰之所。困于繁重赋役的普通小民，则视信佛为逃避赋役之途。这些都是佛教传播的良好条件，故一时寺院兴筑如林，僧尼之数激增。梁武时，仅建康一地，佛寺就增至五百多所，僧尼十多万。最大的同泰寺即成于此时，穷极侈丽，资产丰裕。梁武早晚到寺礼拜，还四次舍身，表示要当和尚，不做皇帝了。但每次舍身，都由群臣赎了出来，赎身钱花了四万万文，钱都是从老百姓身上刮来，通过群臣之手，落入僧侣的腰包。北朝洛阳寺庙，到公元534年，猛增至一千三百六十七所，州郡佛寺多至三万所，僧尼二百万。宣武帝妻胡太后造永宁寺，僧房楼观，大小一千余间，内有九层浮图一座，高千尺，上有闪闪发光的金顶，塔上有金铎一百二十枚，金铃五千四百枚。北朝最大的释迦佛像，高达四十三尺，铸造时耗费十万斤铜，六百斤黄金。当时佛教，大、小二乘并弘，经、律、论三藏共宣，不同体系的佛教学派，纷纷出现，译经、注经的规模都远远超过前代。梁僧佑的《出三藏记集》（十五卷），是至今保存完整的早期《经录》，僧佑的《弘明集》（十四卷）则是一部相当重要的佛教文献汇编。梁慧皎的《高僧传》（十四卷）是中国佛教史上第一部僧传，它们对后代佛教发展有着深远影响。道教的发展在这个时期亦相当可观。道教起源于汉末张角、张鲁之教，晋时称为天师教，在士大夫和下层人民中皆有流传。晋时《抱朴子》（葛洪著）一书更是集道家神仙之说的大成。道教托名老子为教主：“道家之原，出于老子。其自言也，先天地生，以资万类。上处玉京，为神王之宗，下在紫微，为飞仙之主。千变万化，有德不德，随感应物，厥迹正常。”（《魏书·释老志》）道教在北朝，受到帝王的尊奉，被定为北魏的国教。魏太武帝在平城立有天师道场，还亲自到道坛受符箓，表示受了天命。以后，北魏

皇帝即位，都照例要扮演一次受符箓的仪式。道士寇谦之改革天师道，增加了“礼度”和“服食团钵”等具有贵族宗教色彩的内容，以适应统治阶级的需要。后来孝文帝移道坛——崇虚寺于都南桑乾之阴，岳山之阳，给户五十，以供斋祀，可召诸州隐士，员满九十人。北齐道士属崇虚局，局隶太常之大庙署。北周崇奉道法，每帝受箓如魏之旧。苦县（今河南鹿邑东）为老子故乡，该地有老子庙，人们常去拜谒，庾信《至老子庙应诏》诗写道：“三门临苦县，九井对灵谿。盛丹须竹节，量药用刀圭。石似临邛笋，芝如封禅泥。”可以看出有不少方士在这里炼丹修道，烟火相当兴旺。道教在南朝也颇有市场，陶弘景作《真诰》，进一步把道教系统化。梁武帝篡齐时，陶弘景曾经“授引图讖，数处皆成‘梁’字，令弟子进之”（《梁书·陶弘景传》），所以很得梁武信任，遇到重大国事，常询问他的意见，故陶有“山中宰相”之称。

儒、道、释三家既互相吸收融合，但各自为了本身的发展，又相互斗争，有时矛盾表现十分尖锐。这种斗争在南方和北方采取截然不同的面貌出现。南朝主要是教义上的是非之辩，儒、释较量长短，以争取君王的荣宠。齐梁时从哲学上攻击佛教最力的是范缜（公元450—507），他不信因果报应，到处宣传世上本无佛，作《神灭论》根本否定神的存在，神既不存在，佛教便从根本上失去立足之地，而以齐竟陵王萧子良、梁武帝萧衍为代表的拥佛派却对范缜加以围攻，最后范缜在“离经叛亲”的罪名下，不许再发表议论，并被流放到广州悲惨地死去。北朝佛教与儒、道的斗争则更多地带有政治斗争的色彩。魏太武帝为了标榜自己是黄帝的子孙，以谋求汉族士大夫的合作，同时为了和寺院争夺剥削对象，他曾下令禁止事奉“胡神”（佛），周武帝出于类似考虑，为证明自己不是“五胡”，也倡导灭佛。北周禁佛不象魏太武帝那样采取杀人办法，而是在禁佛前举行一场儒、释、道优劣的公开辩论。辩论前，卫元嵩提出倡议：“应该用建造寺